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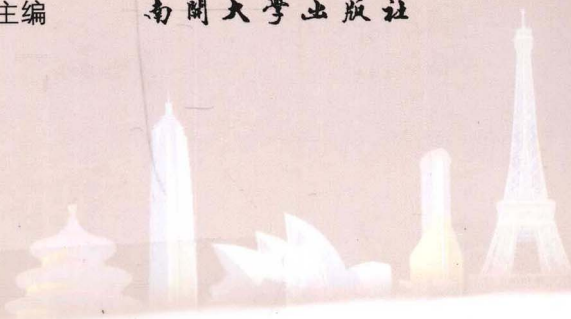
经济与全球化丛书

中国经济改革与 未来发展方向

——首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文集

王艳灵 李坤望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经济与全球化丛书

中国经济改革与未来发展方向

——首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文集

王艳灵 李坤望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改革与未来发展方向:首届中国留美经济学
会会长论坛文集 / 王艳灵,李坤望主编. —天津:南开大
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310-04079-7

I. ①中… II. ①王…②李… III. ①中国经济—经
济改革—文集②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文集 IV. 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72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23.125 印张 4 插页 375 千字

定价:4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一

2010 年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简称 CES) 成立 25 周年。25 年不长, 弹指一挥间; 25 年不短, 是一个里程碑。20 多位历任会长和多位杰出会员相聚一堂, 在 CES 历史上是第一次。“CES 会长论坛”的产生说来也是偶然中的必然。2009 年我当选为 CES 候任会长后, 便开始筹划 2010~2011 年任内的几项大事。当意识到 2010 年是 CES 成立 25 周年时, 我便产生了在 2010 年举办“CES 会长论坛”的想法来纪念这个里程碑。我就这一想法征求了几位前会长的意见, 他们都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和支持。正因为如此, 这一想法才变成现实, 也才得以组织这次高规格的论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 2008 年曾经成功承办了 CES 2008 年会, 作为当年的理事之一, 我有幸与南开的一部分老师和学生们接触, 参与筹备此会。我为南开出色的工作所折服。于是我首先想到了由南开来承办这一高规格论坛。正如我所料, 南开经济学院立即表示愿意承办, 佟家栋副校长和马君潞院长倾力支持。南开的学术实力、社会影响、组织水平再一次展示出来, 从方方面面确保了“会长论坛”的成功举办。

25 年前, 几十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美国的博士生在纽约中国领事馆的支持下创办 CES, 目的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 促进中国与国际学者交流, 以及用经济学的系统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5 年后, 2400 多位 CES 会员遍布全球。CES 在 1992 年成为美国社会学科组织的机构会员, 而且每年都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或独立组织或与 AEA 联合组织论文征集。从 1993 年开始, CES 每年都在中国举办年会。年会不仅重视学术交流, 还组织专题讨论, 有针对性地对某些经济问题进行研讨。从 1994 年开始, CES 每年选派 6 名海外会员到国内大学讲学, 并提供讲学资助。CES 会员就中国经济问题写出了几十本专著。CES 还与其他国家组织合作, 先后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和交流活动, 比如 CES 先后几次到韩国、俄罗斯等。这一系列学术活动充分体现了以下几点: CES 在推动世界范围内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方

面，是一只领头羊；在促进中国本土经济学研究、教育和与世界接轨方面，是一座桥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中，是一个参谋、顾问。今天，CES 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核心组织；CES 的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高规格期刊。

多年以来，CES 在中国的发展得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以及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力支持。我在此谨代表 CES 向各界表示感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国际研讨会还得到了国家外专局的大力支持，国家外专局特地为会议提供了部分经费资助，外专局文教司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会议结束后，国家外专局刘延国副局长还专门在北京会见并宴请了部分 CES 会长。外专局不仅支持 CES 年会，而且还与 CES 的短期讲学项目合作，为 CES 海外短期讲学学者提供最需要的学校，以达到 CES 在中国传授经济学的目的。

CES 的发展壮大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不仅得益于中国各界的支持、世界其他姐妹单位的合作，同时也与 CES 历任会长和理事的卓越领导才能与辛勤工作密不可分。为了感谢历任 CES 会长和资深会员对 CES 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首届“CES 会长论坛”给历任会长和资深会员提供了一个平台，就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这也是 CES 回馈社会的一种极好方式，与 CES 的长期一贯做法相吻合。本次会议是一次小规模的高端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改革与未来发展方向”，共安排六个专题研讨会，以圆桌论坛的形式进行。六个分论坛的议题分别是：“三农”问题与城市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社保与公共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改革以及“中国模式”议题。会议期间，20 位 CES 历任会长及特邀嘉宾吴敬琏教授分别作了发言，所有发言均围绕会议主题，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学术气氛严谨而又热烈。对这些专题的深入研讨不仅对政府制定政策有借鉴意义，同时也能启发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多角度思考。

为了纪念 CES 成立 25 周年，会后由我和另一位会议组织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李坤望教授，共同负责将这次会议的讨论成果集结成书。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各位会长和杰出会员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秦海英博士在整理部分会议发言过程中做了大量工

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王乃合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对所有提供支持、帮助的人和单位敬致谢忱。

· 由于时间仓促及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王艳灵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2010～2011 年 CES 会长

从历史视角看 CES 的成长和责任（序二）

哈佛大学

Dwight H. Perkins

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成立 25 周年的纪念论坛上，我想对学会过去 25 年里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我参加了学会的第二次年会。那时学会的人很少，所有会员的到来也不需要很大的会议室。当时，没有一个人确切知道中国未来会实行市场经济，如果会员想要应用他所学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他们不得不留在北美或者欧洲。直到 1984 年底，中国政府宣布了 1978 年后第一个主要工业改革，其中包括工业品价格放开的改革。在整个 80 年代，我知道只有一个在北美取得学位后返回中国工作的博士，当然可能有其他学成归国的博士。当时，CES 的年会是很少的几个讨论中国经济的平台之一，而这个平台能让从中国来的研究生讨论和畅谈他们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那时，除了我和其他少数几位倾注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外，大多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北美经济学者的关注。

尽管我认为我从一开始就是 CES 的顾问，但我的作用并不是很重要，主要是帮学会找资金。最初是通过福特基金会，后来也找到了其他的一些来源。资金额也不大，那时，1 万美元就能解决学会一年大部分活动的经费。

今天，CES 已拥有两千多名会员，表现很活跃，而且相对来说也有了资金基础和管理结构。一些会员还在北美或者欧洲工作，但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从事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我认为，学会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会由中国经济学者成立，由中国经济学者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学会是从基层发起的组织，它的成立和管理模式可以给中国其他类似的组织提供借鉴。今天的中国，一大部分中国经济学者在国外受过培训后又返回到中国工作，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教授经济学和指导政府如何使用经济

学的主力。在 80 年代早期的中国，少数经济学者自己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一些人参加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讨会，还有一些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年期的研究生培训。研究生的培训也在复旦大学举办过。这些一年期的研究生培训主要是培养学生硕士毕业后到美国研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一个这类的培训是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由 Lawrence Klein 组织。之后又有了其他经济学科的培训。所有的培训讲授都是由北美和欧洲的一流经济学者完成的。我参与组织了发展经济学的一年期培训，和邹至庄教授共同负责（最初这个主意是邹至庄教授想出来的）。到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已和北美的基本一样，而且是由经过国内外培训的优秀博士来讲授。

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刚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不回中国工作，而现在大部分博士一毕业就归国或者在国外工作几年取得一定经验后返回中国。因为从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今天，有更多的归国机会。中国今天的工资水平很不错，而且一些职位的薪水和美国的几乎相当，尽管这不是大部分人归国的主要动因。归国的主要动因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是中国经济学者能帮助解决的。很多挑战从性质上来说是经济学本身能够解决的，或者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只有经过精心培训的经济学者才可能理解这些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

从一定程度上讲，归国的中国经济学者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自身的挑战，就是如何从以超越前辈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为目标的学者，转变成研究中国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的学者。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界很受尊重的研究课题和中国的现实需要有很大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是需要刚毕业的博士花一定时间才能认识到的。一旦选择研究中国面临的挑战，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就会出现，而且这些研究课题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变化很快，如果这些变化来源于对问题的精准理解，那么它们则会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相反，如果这些变化不是来源于对问题的精准理解，那么它们则可能导致不适当的经济结构和机构的形成，从而弊病丛生。

要罗列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写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短篇文章。我认为，包括在过去 20 年和未来 20 到 30 年，最主要的挑战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 6 亿人口将从农村转向城镇。这些人怎样安置？从家庭到单位要配备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是让他们迁移到大

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对这些问题的答复会直接影响到本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但是对这些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将来如何变化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已取得了震惊世界的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成绩，但是可能这些工程已经逐渐失去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作用。别的什么能替代这些动力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过去低得多，不是从 10%降低到 9.1%，而是可能降低到 5%~6%。而且增长速度的降低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想的来得快。增速降低并不是因为政府或者企业的错误导致的，而是因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低速增长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在大约十年前的 CES 年会上，讲了“中国经济给中国经济学者提出的挑战”。我现在罗列的这些挑战也是基于当时的分析，根据现实又加以拓展的。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别人会有一个不同的清单。但对生活在中国和从事与中国有关的研究的经济学者来说，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他们仍然可以从事相关的课题和政策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在美国或者其他高收入国家，大多数治理经济的结构和组织已经发展成型，其政策的变化也是非常小的、边际性的。在中国可不是这样，但这既是机会，也是威胁。我相信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员有能力和手段确保机会占上风，而不是威胁占上风。

我再次祝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过去 25 年里的贡献，以及未来 25 年里的贡献。

（本文由王艳灵翻译，译者非常感谢尹尊声老师对翻译稿提出的建议）

目 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学如何为中国社会进步服务	3
吴敬琏	
中国模式的争议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10
陈平	
中国经济改革与 CES 的历史使命	36
田国强	
人的决策驱动和理性假设——兼评《经济人的本性》	49
孙涤	
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	59
陈爱民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转变	69
陆丁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

沿海城市的高房价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缩小	87
张欣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94
海闻	
现行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98
文贯中	

城乡统筹中的“三个集中”：以成都市为例	117
陈爱民 高洁	
国际背景下中国当前的农业问题	139
王红	
中国城市化：共识与歧见	149
乔依德	

劳动、社保与公共财政

中国现行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57
林双林	
中国实施交通拥挤收费之研究	183
宋顺锋	
中国医改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关于促进民生与经济增长的意义	194
刘国恩	
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及其差异研究	209
李海峥 张晓蓓 贾娜 梁赟玲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的医疗负担	228
侯维忠	

金融体制改革

“堰塞湖”与通货膨胀预期	241
徐滇庆	
中国三大金融改革的利弊分析及相互关系	252
张春	
资本壁垒与产业集群——基于浙江濮院羊毛衫产业的案例研究	266
阮建青 张晓波	
美元体系与泡沫经济	290
黄少敏	

国际贸易问题

- 破解“中国制造”之谜：中国出口战略是否带动了内生技术增长？…… 307
尹尊声
-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的变迁 …………… 323
王艳灵
- 中国出口结构真的升级了吗？ …………… 344
李坤望 宋立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学如何为中国社会进步服务

吴敬琏*

今天我想讲一讲经济学如何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主要讲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经济学理论知识；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是会面临很多障碍的，有社会上的障碍，也有我们自身方面的；第三个就是对怎样改进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出一点想法。

30 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应该说我们经济科学的进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上上下下，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识到要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需要理论的指导，最开始的阶段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这样摸下去。其实到了 80 年代初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我们已经不是过一个小河沟了，已经是过大江大海，这石头是摸不着的，没有底。中国领导人早在 80 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停留在没有预定目标的状态。可是到了 1984 年，中国共产党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这次全会上第一次做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里面主要包括十条，邓小平对这个决定做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在这十条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有各方面的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的知识，这个大江大海是过不去的，因为这石头是已经感觉到摸不着了。中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没有经济科学和别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支持，这个改革开放是难以进行的。正好，我们刚才听现任 CES 会长的介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酝酿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耶鲁，杨小凯从中国来了以后，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博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讲席教授。

和耶鲁的钱颖一他们就找周志良先生来寻思这个事，就是来商量这个事。那是 1983 年和 1984 年，到了 1985 年，CES 成立了。我们的这个协会，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 2003 年第二届经济学年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我有一个演讲，我在这个演讲里面历数了在改革过程中经济科学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支持，历数就是一年一年地说，直到 2003 年。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用的都是“摸石头过河”的方法，其实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不是这样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1984 年的那次决议，更重要的是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现在拿出来看，它对经济制度的各个子系统，它的目标、它的方向，甚至具体实施的步骤，都做了相当深刻的说明，以至于有些问题到今天还没完全实现。比如说，1993 年这个决定里面关于宏观调控的提法，现在来看，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科学知识，那是写不出来的，而这些问题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说，有很多问题，经济科学是弄明白了，而且在政府的文件里也做了规定，但是现在仍然出了很多问题。发生的问题，跟经济学本身的研究不足或者说经济学已经得出的正确结论，包括它理论上甚至方法上的结论，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有关。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转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善到位，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还需要改进。而所有这些方面，都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的话，我们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建设，都很难向前推进。本世纪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改革推进不到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矛盾就积累起来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我们这个专业有关，就是我们经济学研究还有很多不足，或者说是我们经济理论有很大不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理论研究成果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执行层方面的支持，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我想这个有很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一种传统，就是轻视理论思维，甚至抵触理论思维，这么一个很深的传统。

举一些例子来说，今年以来，或者更早一些，就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提倡科学发展观。对科学发展观，我们也被请去做许多干部培训和做一些讲授，我感觉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根据政府的文件，都讲利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但是很少有人讨论，发展的科学是什

么。有一次，我在浦东干部学院讲这个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我就先给我们的这些领导干部提一个问题。我说，大家都很同意，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号召，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作，那么，诸位，是讲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大家能不能说说这个关于发展的科学到底有什么内容，哪怕说一点，也不是全说，随便说一点。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我私下里也问了好多去跟部下宣讲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发展的领导干部，问他们怎么理解这个关于发展的科学，发展的科学讲过些什么，比如说发展经济学等。但这些领导干部都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说是要用科学来指导，但是科学本身讲了什么，没有人去讨论，没有人去关心。

当前还有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显得很迫切。在10月初的时候，发现9月的CPI突破了3%，所以有各种推测出来，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一种季节性的，主要与农业有关，到了10月、11月以后，CPI就会逐渐地平缓下去。结果到了10月、11月，CPI继续上升。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其实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中就多次发生过这种状况。最近的一次就是在2007年，2007年7月CPI就突破了5%，于是我们学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出现了经济过热？实际上经济过热的问题从2003年的第四季度就开始讨论。但是，我们看到官方统计局的官员们在中央台对群众做宣传，当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口号，叫做“经济没有过热，只是要防止从偏快转化为过热”。这是2007年的情况，到了2008年的2月，CPI突破了8%，大概到了七八月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全球金融危机。当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学界的讨论，就是货币超发。货币超发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超发，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做过理论上的深入讨论，只是就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发发议论。关于货币超发，从2004年开始，它的主要渠道是外汇占款，就是收购外汇，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那么它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汇率制度，汇率形成的机制。对于这个问题，一样也没有做深入的理论讨论。2009年货币供应M2增长了27.7%，GDP增长了9.1%，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做理论上的讨论。2009年12月，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总结国家2009年的工作，其中经济方面对我做了一次采访，我其实也没太批评200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对2010年提出一个希望，希望稳一点、悠着点，别那么海量地发货币。结果，据说这个节目被认为不合时宜，没播出。后来在2010年的1月28日，有个